

孟浩然集

刘文刚 著

06.2
4

学出版社



孟浩然年谱

刘文刚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浩然年谱/刘文刚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10

ISBN 7-02-002134-4

I. 孟… II. 刘…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当代②孟浩然-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0288 号

封面设计:徐中益

书名题字:古 干

责任编辑:管士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24千字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0625 插页2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58

定价 7.65 元

序

卞孝萱

一

盛唐诗人中，李白、杜甫之外，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号称四大家。由于李、杜的诗名太大，高、岑、王、孟或被忽视。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中论盛唐诗时，竟不提高、岑、王、孟之名。这四家之中，孟浩然每受压抑。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中评盛唐诗时，即把孟浩然等六人放在王维之下。解放后所出版的中国通史、文学史中，一般认为，孟浩然诗，在艺术技巧上的成就虽高，而思想内容有消极因素。刘文刚同志不满足于研究孟浩然的现状，对孟浩然诗作了新的具体的探索。

文刚同志从孟浩然诗的取材和立意、构思和手法、语言、体裁四个方面，考察了它的艺术特色，指出它具有大巧若拙、美丽如画、天籁之音、擅长五言等特点，形成了清秀淡旷的独特风格。孟浩然诗的淡，是外淡内丰，孟浩然诗的清，是似清实腴。——对所谓“孟浩然体”作了新的阐述。

一般通史、文学史中，只提出孟浩然属于隐逸诗派。文刚同志认为，由于孟浩然诗产生于盛唐时期，孟浩然本人又胸襟高远，所以孟浩然诗也带有豪放诗派的某些特征，可以把它概

11606/11

括为于绵密中见雄阔，冲淡中见壮逸，闲散中见激越，朴素中见绮丽。任何独特的诗风都有其局限性，孟浩然诗确有内容不够丰富深刻和偏重一种形式（五律和短古）的缺憾。文刚同志引用《庄子·骈拇》“骈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的名句之后，说：如果要求孟浩然诗装进纷繁复杂的社会内容，清秀淡旷的风格也就完全不存在了。这是通情达理的评论。

孟浩然是盛唐前期诗人。他对唐诗的发展，有着不可泯灭的功劳。文刚同志从三方面剖析了孟浩然诗的贡献：（一）把广阔的山水和行旅生活引入诗中，扩大了唐诗的题材；（二）真实地抒写了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力地冲击了初唐后期浮靡华艳的诗风；（三）写了大量优秀的五律，使这一刚刚成熟的文学体裁，更富有表现力。孟浩然诗在格调的高古和意境的浑融上，对盛唐诗人有启迪的作用。

著名的诗歌理论家，如唐司空图、宋严羽、清王士禛等，各自总结了孟浩然诗的某些创作经验和艺术成就，吸收到他们的诗歌理论之中。因此，孟浩然诗对研究我国古典诗歌理论，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刚同志提出的这些观点，是新颖可喜的。

二

从学术界发表的论著来看，对于盛唐四大家，评述高适、岑参、王维者很多，而研究孟浩然诗者寥寥无几，考证孟浩然生平者尤寡。这是因为，有关孟浩然生平的材料太少，人们难

于问津。文刚同志从正史、野史、别集、诗话、笔记、小说、金石、舆地等一百三十一一种书籍中搜集到有关孟浩然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资料，去伪存真，钩微抉隐，对孟浩然的家世、里居、交游、生平行事、思想活动、创作道路、诗文系年，以至子嗣、坟墓等，作了细致的探索，撰成《孟浩然年谱》，基本上再现了孟浩然的一生。

从一九八一年文刚同志写出《孟浩然年谱》初稿后我曾几次阅读，感到有不少优点，举例来说：

（一）文刚同志把一些分歧的、纠缠不清的问题，放到古代的、特别是唐代的社会风尚中去考察，以求得合理的解答。如根据《唐语林》、《云谷杂记》隋及唐初人“以字行”、“以字为名”的记载，指出“浩然”是字；参考江总字总持、杜牧字牧之、荆浩字浩然的实例，指出“名浩，字浩然”这一命名形式，乃是当时一种流行的命名形式。又如：根据古人命名，名与字在字义上有联系的习惯，指出《唐才子传》所载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之张子容，与《天顺襄阳郡志》所载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之张悌，殆为一人，名悌字子容。又如根据王昌龄在政治上基本属于张九龄一派，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判断王昌龄之贬岭南，不可能距离张九龄贬荆州的时间太远，应在开元二十六年秋，不会拖到二十七年，孟浩然《送昌龄王君之岭南》诗应是二十六年秋在襄阳所作。

（二）孟浩然的诗几乎都取材于自己的生活，一部诗集可以看作一部自传。文刚同志采取“以孟证孟”的内证方法，从孟浩然诗中发现问题，再用孟浩然诗来解决问题，取得显著的效果。如放情山水，喜作漫游，是孟浩然生活的特点之一。文

刚同志对孟浩然的游踪，作了全面的考证：东到吴越，西至巴蜀，北上长安、洛阳，南下三湘、赣石，足迹所至，几达半个大唐版图。又作了具体的考证，其中有学术界从未探索过的，如：孟浩然二十九岁游洞庭，三十三岁至三十九岁游维扬，四十一岁游洛阳；有学术界虽提出看法，但不够准确，故进行厘正的，如：一般认为孟浩然游长安是开元十六年，其实是十五年，游吴越是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其实是十七年至二十年；有学术界提出的看法虽不错，但不够详尽，故为之补充的，如对开元二十四年孟浩然游蜀详情和二十五年至荆州，入张九龄幕详情的考证等均是如此。

孟浩然有《同张将军蓟门看灯》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蓟门“非浩然游踪所及”，此诗是“后人窜入”。文刚同志考出：开元十六年冬，孟浩然离开长安往游蓟门，十七年新年“看灯”，不久返回洛阳，历程完全吻合，此诗不赝。

从晚唐起，纷传孟浩然于开元十六年在长安向玄宗诵诗，遭受斥逐。文刚同志将这些传说归纳成四类，逐一进行辨析：（1）因王维而见玄宗说，出于《唐摭言》、《新唐书》、《临汉隐居诗话》，历代诗话、笔记、方志辗转传抄，至今仍为人们所乐道。当时王维官职甚卑，不可能伴直内苑，玄宗也不会幸其宅。（2）因李白之荐而见玄宗说，出于《北梦琐言》。李白于天宝三载始召入翰林，而孟浩然已于开元二十八年逝世。（3）因张说之荐而见玄宗说，出于《唐诗纪事》。当时张说已致仕，不会特别推荐一位布衣。（4）因李相推荐而见玄宗说，出于《诗话总龟》。《总龟》所载孟浩然留给李相的“老夫一日门前立”七绝，不像他的作品。文刚同志驳斥了四种谬说，并考出孟浩然

两入长安，第一次是开元十五年，第二次是开元二十二年。世传孟浩然向玄宗所诵“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乃是《岁暮归南山》诗句。从“北阙休上书”看出此诗是作于上书求仕失意之后，“南山归敝庐”说明已回到襄阳老家，“青阳逼岁除”更证明写作时间在年底立春之际（孟浩然两次离京，都在这个时刻之前）。应是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孟浩然出长安返襄阳之后。此诗的内容恰好否定了孟浩然向玄宗诵此诗的传说。文刚同志还驳斥了王维妒忌孟浩然才胜于己，不肯力荐之说，指出这是宋人根据孟浩然向玄宗诵诗传说的推测之词。

为探索孟浩然的游踪，文刚同志对孟浩然诗中的地名，作了不少精细的考证。如：据《陈书》、《唐语林》，考出孟浩然《下赣石》诗之赣石，在南康境内，纠正了《渔洋诗话》以为在赣州之误。又如：据杜预说及《旧唐书》，考出孟浩然《从张丞相游南纪城猎戏赠裴迥（迪）张参军》诗之南纪城即纪南城即郢城。

（三）由于有关孟浩然的材料太少，文刚同志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条可以利用的线索，进行考证。例如：

对孟浩然诗集不同版本的利用，如：孟浩然有《送丁大风进士举》、《宿业师山房待丁公不至》（影宋本）等诗。“丁公”，《文苑英华》作“丁大”，《诗林广记》作“丁凤进士”，可从。又有《湖中旅泊寄阎昉》（影宋本）诗。“昉”，影明铜活字本、四部丛刊本、《全唐诗》本以及《河岳英灵集》、《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引孟浩然诗皆作“防”，是。又有《从张丞相游南纪城猎戏赠裴迥张参军》（影宋本）诗。“迥”，影明铜活字本、四部丛刊本、影汲古阁本、《全唐诗》本皆作“迪”，是。孟浩然与王维交厚，裴迪亦与王维交厚，孟、裴是可能相识的。

对孟浩然与友人唱和诗的利用，如：孟浩然有《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作》、《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影宋本）等诗，张子容有《除夜乐城逢孟浩然》、《乐城岁日赠孟浩然》等诗，显然是唱和之作。孟浩然诗中之“张少府”当即张子容。唐乐城县属温州。当是开元十九年孟浩然漫游吴越时往乐城看望张子容。孟浩然称张子容为“少府”，与《唐诗纪事》载张子容为“乐城尉”相合。《唐才子传》言张子容为“乐城令”，误。

（四）文刚同志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条可以利用的线索，也不轻易采用任何一条可疑的材料。如：唐彦谦有《忆孟浩然》、《过浩然先生墓》、《赠孟德茂（浩然子）》等诗，刘师培以为“彦谦距浩然百余年，未必及见浩然之子，则此非彦谦诗矣。”（《读全唐诗发微》）文刚同志考出，唐彦谦《赠孟德茂》诗有“平生万卷应夫子”句，又有《闻应德茂先离棠溪》诗，“孟”为“应”之讹，三首诗均彦谦为应浩然、应德茂父子作。

文刚同志还肯定孟浩然行六，否定“孟大”、“孟八”之说；肯定孟浩然享年五十二岁，否定五十岁之说；判断南园是孟浩然的家而鹿门山是隐居之地；判断孟浩然之墓在凤林山而衣冠冢在鹿门山，等等，均有助于人们对孟浩然的准确了解。

三

“平生重交结”是孟浩然生活的又一大特点。文刚同志对孟浩然交游的考证，费了相当功夫，举例来说：

深入探索孟浩然与某些友人订交的因素。如：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范阳张九龄、河东裴朏、范阳卢僎是孟浩然的“忘

形之交”，什么是他们成为“忘形之交”的因素呢？文刚同志用裴朏自称“挂冠投绂，卧壑栖林”（《大唐故朝议郎行尚书祠部员外郎裴君墓志铭〔并序〕》），证明裴与孟思想上有某些契合；用芮挺章编《国秀集》，选卢僎诗最多，说明卢在当时颇负诗名，与孟文学上有契合，等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张九龄“隶籍岭南，以曲江著号，安得署曰范阳？”文刚同志举出徐浩《唐尚书省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称张九龄“其先范阳方城人”，证明王士源序文不误。

孟浩然诗中提到某些人，有姓无名，文刚同志进行了考证。如：据张九龄、宋鼎唱和诗以及《唐诗纪事》，考出孟浩然《元宋大使北楼新〔亭〕》诗之“宋大使”名鼎；据《唐郎官石柱题名》、《唐会要》考出孟浩然《上张吏部》诗之“张吏部”名均；据《元和姓纂》、《通典》、两《唐书》、《海录碎事》考出孟浩然《〔答〕秦中苦雨思归而〔赠〕袁左丞贺侍郎》之“袁左丞”名仁敬，“贺侍郎”名知章。

孟浩然诗中的某些人名，前人考证错误，文刚同志进行了厘正。如孟浩然有《和贾主簿弁九日登岷山》、《送贾昇主簿之荆府》（影宋本）等诗，岑仲勉以为“弁”为“昇”之省写，“昇”为“昇”之讹。文刚同志据《唐裴观德政碑》“唐贾昇撰，僧湛然书，开元八年立在岷山”，指出“昇”字不误，而“弁”为“昇”之误刻。孟浩然又有《秋登兰山寄张五回夜于园作》等诗岑仲勉以为“张五”名诩。文刚同志指出，“张五”与张诩里贯不同，隐居之地不同，不容相混。又，孟浩然《送席大》诗云：“惜尔怀其宝，迷邦倦客游。……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或以为“席大”名豫。文刚同志据两《唐书》载席豫仕至检校礼部尚书，非

怀才不遇者。

因探索孟浩然交游而涉及某些友人的生平，发现文献记载，前人考证有遗漏，有错误。如：孟浩然有《卢明府泛舟回作》、《同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亭》、《卢明府九日宴袁（韩）使君张郎中崔员外》、《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就张瓜海作》等诗，是开元二十三年在襄阳作，“卢明府”名象，时为襄阳令，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未载卢象为此官。孟浩然又有《送王大校书》诗，是开元二十四年在襄阳作，“王大校书”名昌龄，时归故里。王昌龄故里，有长安、太原、江宁诸说，皆不合。从王昌龄由长安经襄阳归故里来看，其故里当在楚地（江宁为王昌龄仕宦地）。此外，《唐诗纪事》载张子容先天二年登进士第，不误，而《唐才子传》、《登科记考》误作先天元年。《旧唐书》载王维开元九年、《历代名画记》载王维十九岁登进士第，俱不误，而《唐才子传》、《登科记考》误作开元十九年。《唐才子传》载刘眘虚开元十一年登进士第，而《登科记考》漏载。文刚同志所做的这些考证，对研究孟浩然以及盛唐诗人，都是有意义的。

“领异标新二月花”。用这句诗来形容《孟浩然年谱》，不为过分。文刚同志既对前人不妥当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又对前人未涉猎的问题，发表了新见。领异标新而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牵强附会，矫揉造作，这是《孟浩然年谱》的学术价值所在。当然，这些异议、新见，能否成立，能否为学术界所接受，还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四

文刚同志比我年轻二十几岁。我与他是一九八二年在成都认识的。《孟浩然年谱》是使我们认识的媒介。他撰写出版《孟浩然年谱》的年龄，与我过去撰写、出版《刘禹锡年谱》的年龄相似。《刘禹锡年谱》出版以后，经过二十几年的增补，准备再版。学然后知不足。从我自己对《刘禹锡年谱》进行修订的经验，推想到文刚同志在出版《孟浩然年谱》之后，必然也会继续钻研，不断提高。现在，我看到《孟浩然年谱》出版，感到高兴，特为撰序；他年，我看到文刚同志对孟浩然以至全唐诗的研究，取得更大的成绩，将更加高兴，还要再为之撰序。

学海无涯，文峰无顶。祝愿文刚同志猛进不止！

一九八四年七月

前 言

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人中，孟浩然是一位异彩闪耀的诗人。他“未禄于代”^①，而以隐名于世。伟大诗人李白赠诗给他：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徙此揖清芬！^②

这是李白心目中的孟浩然，也是一般唐人心目中的孟浩然——一位多么倜傥而又飘然出尘的逸士！

孟浩然生于武则天永昌元年，卒于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享年五十二岁（公元六八九——七四〇）^③。他少年时代与弟兄们一起闭门读书^④，“幼高为文”^⑤。二十岁前后作的《题鹿门山》，就显出了自己的风格。二十三岁前后作的《夜归鹿门寺》

①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

② 《赠孟浩然》。

③ 宋本《孟浩然集》载五十岁，当误。见年谱谱首部分。

④ 浩然《入峡寄舍弟》：“吾昔与尔辈，读书常闭门。”

⑤ 陶翰《送孟大（六）入蜀序》。

及二十九岁作的《岳阳楼》，表明他已经是独具风格、才华超群的一代优秀诗人了。

他学书的时候也学剑^①。青年时代即“好节义”^②，“救患释纷以立义”^③。《送王宣从军》写道：“平生一匕首，感激赠夫君。”他确实是一位具有侠士风采的富于正义感的诗人。

孟浩然生在襄阳郭外祖上留下的庄园里，自幼受着秀丽山水和幽美田园的陶冶，也受着襄阳古代隐逸高风的熏染。“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④他对古代隐士非常景慕。“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上人。”（《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加之生活的唐代，又是隐逸之风盛炽的时代，自然容易走上隐逸生活的道路。二十三岁前，孟浩然就和好友张子容同隐鹿门山，过着“隐居仍读书”^⑤的生活。张子容仕宦后，他回到自己的庄园里，仍然过着隐居生活。《忆张野人》写道：

与君园庐并，微尚颇亦同。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门无俗士驾，人有上皇风。何必先贤传，唯称庞德公。

正像诗写的那样，他的隐居生活，就是在家饮酒、赋诗、弹琴、垂钓、接待来访的朋友；有时访田家、过别业，与辛谿、王迥

① 浩然《伤岷（山）云表观主》：“少予学书剑”。“书剑”虽系用典，亦为写实。

② 《新唐书》卷二〇三《文艺传》。

③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

④ 闻一多《唐诗杂论·孟浩然》。

⑤ 王维《戏赠张五弟諲三首》之二。

这样的逸人交往；有时也拜佛寺、谒道观，与融公、湛然这样的衲子和参寥这样的羽客过从。间或也打打樵、下下地，那不过是为了“全高”^①的象征性劳动。

放情山水，喜作漫游，是孟浩然生活的又一特点。孟浩然对养育他的故乡山水，有着特殊的感情。“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登望楚山最高顶》）在他眼中，故乡的景色分外美丽。他一生踏遍了襄阳的山山水水，又“遍观云梦野”（《陪独孤使君同（册）与萧员外登万山亭》），在襄阳周围，特别是襄阳以南广泛漫游。他也经常辞乡远游。东到吴越，西至巴蜀，北上长安、洛阳，南下三湘、赣江。足迹所至，几达半个唐帝国，而且其中很多地方还三番两次游历过。他虽然主要借山水陶冶性灵，“游不〔为〕利，期以放情”^②，而在漫游中也干谒过，有求仕之想，所谓“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自浔阳泛舟经明（湖）海》）。从成人到逝世，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在漫游中度过的。

孟浩然“平生重交结”（《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耀）见寻》），交游非常广泛。就官吏而言，有张说、张九龄这样的一代名相，也有主簿、丞、尉一类小吏。这些人大多正直清廉，于此也可可见他的操守。孟浩然常以布衣傲视公卿权贵。据王士源记载，山南采访使、襄州太守韩朝宗欲荐他于朝，“后期〔浩然，叱曰：‘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久（夕）不赴。由是闻（间）罢。”^③他不赴荐或许有别的原因，但这样对待韩朝宗，不能不说有点狷傲。张九龄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把他引入

①②③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

幕中，他很感激。然而，对陪张九龄出猎，却感到很不自在，公然作诗发牢骚，写道：“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张丞相游南纪城猎戏赠裴迥（迪）张参军》）他和襄州太守宋鼎的诗，更直接表示自己的傲岸：“愿为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客，丘园一竖儒！”（《和宋大使北楼新〔亭〕》）王士源说他：“行不为饰，动求真适，故以（似）诞”^①，是符合实际的。他实在是一位耿介放旷的布衣之儒！

为隐而隐的隐士，世间本不曾有过。历来隐居的原因尽管各有不同，然而，归纳起来却不外两种情况：一是不满现实，遁迹山林；一是暂栖草莱，待机进取。唐代社会繁荣兴旺，一派升平景象，积极进取是士大夫的共同特点。“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②王维这两句诗就是时代的真实写照。

孟浩然少年时代就立下了“鸿鹄志”（《洗然弟竹亭》），他昼夜自强，希望步入仕途，实现“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的理想。他满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华会少年得志，别人也以为他会轻而易举地“转（转）扶桑”（《山中逢道士云公》），可是，隐居求仕的企望很快遭到了破灭。三十岁前后，他仕宦的欲望非常强烈，这集中地表现在当时写的《书怀贻京邑同好》和《田园作》中。后一首写道：“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他热望进取，而又苦于无门路。四十岁，他上长安应进士举，下第后又寻求献赋的机会。四十六岁，他再次上长安求仕。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努力统统都付与了流水。像他

①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

② 王维《送蔡母潜落第还乡》。

这样出身于布衣而又禀性正直的才士，要进身仕途，真正谈何容易！

孟浩然的思想相当复杂。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他都有明显的影响。他谙熟释道经典，喜欢谈玄。曾表示要皈依佛门，写过“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寻香山湛（湛）上人》）的诗。又向往成仙，有“日夕望三山，云涛空浩浩”（《宿天台桐柏观》）之句。甚至有人说他是“仙宗十友”^①之一。可是，对他一生发生决定影响的，却是儒家思想。他生在“家世重儒风”（《书怀贻京邑同好》）的家庭，“诗礼袭遗训，趋庭霑末躬”（同上），自己也以继承儒风自任。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使他把求仕和隐居和谐地统一起来。求仕失意后，他以道不行的孔丘自况，继续保持着自己崇高的品格和操守。他所以受到当时和后代的深深景仰，原因大概主要也在于此吧？

然而，不得志的境遇，仍然给他的思想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和变化。如果说“壮图哀未立”（《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耀）见寻》），“穷通若有命，欲向论中推”（《晚春卧病寄张八》），主要表现的是失意的痛苦的话，那么，两次长安求仕不遂作的《（答）秦中苦雨思归而（赠）袁左丞贺侍郎》、《京还赠张淮》、《留别王侍御》等诗，则突出地表现了愤激。从自己的失意中，他对社会的阴暗面有了某些认识。他写道：“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卧病寄张八》）“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别王侍御》）《岁晚归南山》更明确表示，自己怀才不遇，是

^① 叶廷珪《海录碎事》。